

吴地东周贵族墓地探析

陈瑞近

(苏州市市区文物保护管理所 江苏苏州 215000)

The consecutive findings of Wu, Chu and Yue noblemen's tombs at Wu State territory has gained great interest in the academia. As regards to the tombs' exact time and their origin is still a great mystery. After research both on material findings and literacy, the paper concludes that Zhen-shan Tomb belongs to a nobleman of Wu State, Tomb of Hongshan Noble falls into middle Warring States period instead in the early stage of it.

Key Words :Wu State Territory Zhenshan Tomb of Wu Hongshan Tomb of Yue Xiaozhenshan Graveyard of Chu

内容提要 吴、越、楚贵族墓地在吴地相继发现,引起了学界极大的关注,关于发掘简报中墓葬时代及其国属问题仍值得商榷。经实物论证及对照文献资料分析,结论为:有争议的真山大墓国属应是吴国贵族墓,鸿山贵族墓地应是战国中期,而不是战国早期。

关键词 吴地 吴真山大墓 越鸿山墓地 楚小真山墓地

中图分类号 K871.3

文献标识码 A

一 墓地发现的概况

20世纪90年代中叶到21世纪初,在苏州市的西北10~20公里的范围内相继发现了小真山楚国贵族墓地、大真山吴国贵族墓地,在相邻的无锡鸿山又发现了越国贵族墓地^[1]。

小真山和大真山同为真山的两个山脉,距苏州浒关镇1.5公里,鸿山越国贵族墓地分布范围大致为:南至苏州的浒墅关,北至无锡的鹅湖,东至苏州的黄埭,西至无锡的鸿山。这3个墓地实际上是相毗邻的,从目前的区域划分是处于苏州和无锡的交界处。在真山共发现57座墩,时间为春秋~汉,已发掘的春秋墓2座D9M1、D16M1,战国墓3座D1M1、D2M1、D3M1。吴国贵族墓地中D9M1最为突出、影响最大,它位于大真山的主峰,高76.9米,现存封土台顶部东西长26、南北宽7米,底部东西长70、南北宽32米,墓底到封土顶高约8.3米,有内外封土,外封土有南北、东西向挡土石墙各1条,墓室为基岩墓,方向273°,由山体本身向下凿,四壁不很规整,墓口呈长方

形,东西13.8,南北最宽处8米。墓口四周有二层台,东面有一条长3.6、宽3米的墓道,整个墓室位于主峰正中,墓室中部偏西有一棺床,长4.05、宽1.92米,其上有两条宽0.25、深0.2米的南北向沟槽。此墓发掘时发现有一条长18、宽约3米的盗沟,从东面直插墓室中部。从棺床上层层叠压的漆皮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棺槨在被盗时,盗墓者仅从东部将尸体拖出,棺槨顶部没有受到破坏,由于两千多年来受雨水等侵蚀,整个棺槨木质基本腐烂,仅存层层漆皮,根据漆皮的叠压及其纹饰的比较,发现此为七棺二槨之墓。墓遭劫之余还出土了玉面饰、珠襦玉甲及数以万计的玉石珠,还有剑配饰、原始青瓷盖罐等一批文物。从出土的器物特征来看,此墓为春秋中晚期,与河南浙川下寺M1的时代比较接近,为春秋晚期前段(公元前570~公元前553年)。根据其墓所处的地理位置、封土、墓葬规模、七棺二槨、玉敛葬、兽面纹图案,结合文献记载,可以推断该墓为吴王寿梦墓。

收稿日期 2007-09-01

位于D9M1北距约200米的大真山北山脊上的D16M1,也是凿山为穴,在其周围堆筑石块作为四面墓壁,墓室呈斗状,上宽下窄;纹石为槨。墓口长6.9、宽5.6、底长4.3、宽2.9米。方向273°。外为封土台,高5、直径34米。在墓室西部发现7件原始瓷盖碗,呈花瓣状排列。另有印纹硬陶瓮、陶盘、陶纺轮等,时代同D9M1,为春秋中晚期。

楚国贵族墓地分布在小真山上,D1M1位于小真山的主峰,海拔32.2米,凿山为穴,虽被开山炸石所破坏,但从保存下来的东壁和北壁反映,墓室修建得非常规整,D1M1为甲字型大墓,方向180°。墓口长11.6、宽9.7米,墓底长6.5、宽5.45米。其墓地分别D1M1、D2M1、D3M1所组成,呈品字形组合。D1M1虽被开石时炸坏,但还出土青铜鼎4、盃1、戈4、鏃5、剑2、镞7、弩机1、灯1、印1件,另有玉器7件,印有“郢爱”的陶冥币2件。其墓葬最有特点的是,在墓门口,墓道两侧分别竖靠长秘2件、铜戈4件,戈锋朝向墓道,每件分别由铜戈、木秘、铜鏃组成,长1.65米。此墓俗仅见于安徽长丰战国晚期的楚墓中,其中,M11的墓道中清理出带兽头王龠的铜戈10件,木秘和铜鏃均斜靠在墓道两壁,戈头指向墓道口。该墓地的M1~M9中,多数墓在墓道两壁摆到3~5对铜矛和相应数目的漆盾,墓道形制也相似,墓口有台阶,都有二层台……

所以D1M1与安徽长丰战国楚国墓地均属楚国贵族墓葬,也是同一时期的战国晚期墓葬,重要的是D1M1出土了1枚铜印,印文为“上相邦玺”,经曹锦炎先生考证,证明墓主曾担任过楚相一职,春申君为楚相,《史记·春申君列传》记载:“考烈王元年,以黄歇为相,封为春申君,赐淮北地十二县,后十五岁,黄歇言之楚王曰:‘淮北地边齐,其事急,请以为郡使。’因并献淮北十二县,请封于江东。考烈王许之,春申君因城故吴墟,自以为都邑。《越绝书·吴地传》曰:‘春申君,楚考烈王相也。烈王死,幽王立,封春申君于吴。三年幽王征春申为楚令尹,春申君自使其子为假君治吴。十一年幽王征假君,与春申君并杀之,二君治吴凡十四年。’从上述墓葬规模、型式、葬俗、出土物、时代,以及结合文献来看,可以确认D1M1为春申君墓。

D2M1位于D1东北28米,也是凿山为穴,甲字形,北部有一条斜坡墓道,方向180°。墓底长3.2、宽3.3、自深4.3米,墓道长9、宽1.9米。现

存土墩高3.5、直径24米,因墓坑内填土吸水性强、水分足,大部分遗物均已腐朽。出土物仍陶器为主,鼎2、钲2、盒2、杯2、勺4、罐1、缶头1件,另铜镜一面已腐蚀不清。

D3M1位于D1M1和D2M1的东南侧,三者呈品字形,也是凿地为穴,为长方形竖井式,方向180°,没有墓道,有二层台。墓口长5.8、宽4.6米,底长3.5、宽2.15米,自深5.15米,内置一棺一槨,出土陶器有鼎4、敦2、壶2、甗2、熏1、缶头1、铁剑1、玉扳指1、玉印1件。

这3座墓同在小真山,呈品字形,从出土物分析为同一时期,再从随葬器物看,D2M1为女性,D3M1为男性,D1M1为春申君墓,可见D2M1为其夫人,D3M1为其子,一并被杀。小真山墓地的发现,大大丰富了战国晚期楚国贵族墓葬的材料。

鸿山越国贵族墓发现于无锡市锡山区鸿山镇东部,经调查,其分布范围,南至苏州的浒墅关,北至无锡的鹅湖,东至苏州的黄埭,西至无锡的鸿山,东南距苏州市区20公里,西北距无锡市区20公里,该地区保存着大小土墩近百座,分布在东西6公里,南北4公里的地域内,从2003年3月~2005年6月共发掘战国时期越国贵族墓葬7座,可分小型、中型、大型和特大型四个等级,第一级为丘承墩,封土东西向长68.2、宽40.6、高3.95米,墓葬位于土墩近中部,竖穴、深坑,平面呈“中”形,墓坑残长56.7米,由墓室、后室、墓道三部分组成,墓室长23.6、宽6.3米,后室长11.9、宽3.2米,墓道长21.2、宽3.65米,有壁龛早年被盗,随葬器物达1098件,其中有大量的佩玉、葬玉,成组成套的仿铜礼器和乐器均为青瓷器,另有琉璃釉盘蛇玲珑球形器、成组成对的青瓷角形器和璧形器。

第二级别为老虎墩,长方形覆斗状封土,埋葬方式为平地铺木,随葬器物500余件,其中有大玉琕等玉器,成组成套的仿铜乐器中既有青瓷器,亦有硬陶器,而仿铜礼器则均为硬陶器,生活用品为硬陶器和泥质陶器。

第三级别为万家坟与老虎墩的封土规模和平地铺木的葬制相同,随葬器物共计519件,然其中仅有成组的硬陶乐器而不见青瓷乐器,仿铜礼器和生活用品均为硬陶和泥质陶器。

第四级别为曹家坟和杜家坟,为长方形覆斗状封土,墓葬长8~9米,随葬器物均约为100件。

第五级别为老坟墩和邹家墩,为长圆形馒头

状封土,墓葬长约4米,随葬器物约为50件。

这些仅是鸿山贵族墓地近百座长方形或覆斗状长方形土墩中发掘的7座,根据发掘者所写的《无锡鸿山越国贵族墓发掘简报》认为,墓葬的年代可定为战国早期,在公元前470年左右。在《鸿山越墓发掘报告》中认为大致年代为春秋末期到战国早期。

二 关于鸿山墓地时代讨论

从上述简报内容分析,鸿山贵族墓地的年代问题仍值得商榷。

人们所知,要形成近百座土墩的规模,且又分成小型、中型、大型和特大型墓葬,如此等级森严的墓地不可能在几年内就能形成。《左传·哀公二十二年》(公元前473年)曰:“冬十一月丁卯,越灭吴。”《吴越春秋》卷十勾践二十五年(公元前472年)越王既已诛忠臣,霸于关东,从琅琊起观台,周七里以观东海。“越灭吴,次年,即迁都琅琊。《纪年》曰:“晋出公七年(哀公二十七年公元前468年)于越徙都琅琊。”《越绝书·记地传》曰:“允常子勾践,大霸称王,徙琅琊,都也。”《水经注·淮水》:“琅琊,山名也,越王勾践之故国也,勾践并吴,欲霸中国,徙都琅琊。”所以越王灭吴北迁琅琊是事实,当然次年(公元前472年)开始迁,直到(公元前468年)正式迁毕,要有一个过程,也是正常的。但核心问题是琅琊已作为越国都城了,怎么可能还在鸿山建贵族墓地呢?更何况《吴越春秋·勾践伐吴外传》曰:“越王使人如木客山,取元常之丧,欲徙葬琅琊,三穿元常之墓,墓中生燔风,飞沙石以射人,人莫能入。勾践曰:‘吾前君其不徙乎?’遂之而去。”勾践连自己的父亲都准备迁葬到琅琊去,怎么可能还在吴地鸿山建贵族墓地呢?从道义上讲似乎不合情理。那么,以文献记载中是否能找到更符合情况的史实呢?的确,要建立这么一处近百座有等级的墓地,应该能在文献史料中找到蛛丝马迹。

我们从《史记·越王勾践世家》中知,勾践卒,子王鼫与,继而不寿,一翁一翳一之侯一无疆。特别是索隐《纪年》云:“翳三十三年迁于吴,三十六年七月太子诸咎弑其君翳,十月越人杀诸咎越滑,吴人立孚错枝为君……”也就是越王翳三十三年迁于吴,其年为公元前379年。直至《史记·越王勾践世家》曰:“……于是越遂齐而伐楚,楚威王兴兵而伐之,大败越,杀王无疆,尽取故吴地至浙江。”其年为公元前334年。先后在吴共45年。这先后

二次比较似乎后一次更符合实际一些,更合乎情理。所以,从文献记载分析,鸿山越国贵族墓地的时代应该为公元前379~公元前334年,也就是战国中期。

那么发掘出土的遗物,是否能和文献史料相吻合呢?首先,我们从墓地中出土的最具有代表性、数量最多的青瓷器来进行分析。胎质,简报中介绍为:“仅最大的墓、丘承墩出土的一半以上的581件,大部分胎色灰白,或局部泛红,釉色泛黄,脱釉严重,其中部分胎色泛白或灰白,釉色泛青,胎釉结合好,烧成温度高,与常见的原始青瓷器有着明显的差异。我们不妨将同地出土的战国的青瓷器比较一下,如长桥新塘战国墓地出土的原始青瓷碗(M1:9、M1:11、M1:13)^[2]三件形制基本相同均为尖唇、直折腹、小平底、假圈足,内壁有轮制弦纹,薄绿釉,灰白胎明显不同。和江、浙、沪出土的战国早期原始青瓷器相比均相异,但和浙江余姚老虎山一号墩^[3]出土的原始青瓷器却比较接近,此为战国晚期。特别是和淮阴高庄战国墓中的原始瓷器胎质更为一致^[4]。不仅如此就连几何印纹陶,高庄墓的纹饰为麻布纹,而鸿山墓地出土的印纹硬陶纹饰也为麻布纹和米字纹,纹饰完全相同。但高庄墓的年代为战国中期。出土的龙形佩和绍兴306号墓^[5]相比,明显发现绍兴306号战国墓中龙形玉佩(M306:40,图一)和虎形佩(M306:47),完全继承西周春秋虎形佩的余韵,而鸿山墓的龙形佩完全没有这种遗风,而是带有战国晚期龙形佩和凤形饰的风格(图二)。再看蛇的装饰完全和高庄墓的如同一辙,所以说鸿山越国贵族墓地的年代应为战国中期。

正如简报中所云:“乐器共计140件……除磬为仿石,缶为瓦器外,其余皆仿青铜器,其中既有



图一// 绍兴306号墓出土龙形玉佩



图二// 鸿山越墓出土龙形玉佩

仿中原系统的甬钟、鎛钟和磬,亦有越系统的句、鐃、丁宁、鐃于、振铎、三足缶、悬鼓座和悬铃。”为什么既有继承越传统的乐器,又有吸收了中原风格的乐器呢?毫无疑问,越在琅琊建都称霸中原,大量地吸收了中原的先进文化,所以说,在越灭吴后不可能马上就有大量的鸿山乐器出现在墓中。

再和浙江长兴鼻子山越国贵族墓出土物比较,鼻子山越墓出土的璜、管、璧、瑗等玉器,更具有春秋晚期、战国早期的特征,明显早于鸿山越墓的玉器,出土的陶器品种都是典型的越国早中期的器物,这说明鸿山越墓中的一批乐器、陶器是越国的常见之物,有明显的递嬗关系。长兴鼻子山越墓时代为战国早期晚段,鸿山越墓的时代明显晚于长兴鼻子山越墓。这一点鸿山越墓的5个木炭标本经过碳十四测定年代也得到了证明。

上述考古事实充分地说明了鸿山越国贵族墓地是战国中期的墓地,和文献史料中“翳三十三年迁于吴”完全吻合。那么对墓地时代为什么会出现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和战国中期的不同看法呢?

可以从简报“相关问题的讨论”章节中带有结论性倾向反映出来了,文章所持的观点是宁镇地区的湖熟文化是吴文化,而太湖流域的马桥文化就是越文化的观点,认为苏州原为越地,真山大墓(D9M1)也是越国贵族墓葬。在这一观点的驱动下,当然不可能去作实质性的探讨,如将吴、越、楚3个贵族墓地稍作比较,就能发现他们各有鲜明的个性,无论是墓葬所选位置、墓葬结构,还是随葬品组合,尤其是鸿山越国贵族墓和D9M1比较,都没有丝毫的递嬗关系。而与浙江的越国墓葬及

越迁都琅琊后所出现的淮阴高庄墓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三 吴、越关系探析

应该说吴、越、楚贵族墓地的形成与一定的历史背景分不开。东周时期不同势力权力的斗争,使王朝兴衰,政权更迭,于是留下一些大的动荡痕迹。笔者认为,在吴地发现鸿山越国贵族墓地和小真山发现楚国贵族墓地一样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鸿山越国贵族墓地的发现对促进了吴文化研究提供了极为珍贵的资料。它提示人们要研究吴文化必须深入了解、认识、熟知越文化,可以运用越文化研究成果中的新方法来研究吴文化,起到“他山攻玉”之效。研究吴文化的核心是要准确地认识吴地,在这一问题上越文化专家们又是如何认识的呢?

在吴地的形成问题上,正如地理历史学家陈桥驿先生在多篇文章^[6]中提到,中国东部沿海,从第四纪晚更新世以来,曾经发生过三次海侵,即星轮虫、假轮虫和卷转虫海侵。在卷转虫海侵,整个宁绍平原就沦为浅海。宁绍平原的自然环境迅速恶化,居住在这片平原上的越族居民纷纷流散,流散的道路主要有三条,其中一批人越过今杭州湾向浙西和苏南的丘陵地迁移,他们就是以后称为勾吴的一族,是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和良渚文化的创造者。《越绝书》卷六:“吴越为邻,同俗并土。”《越绝书》卷七:“吴越二邦,同气共俗。”《吴越春秋》卷六曰:“吴与越,同音共律,上合星宿,下共一理。”《吕氏春秋·知化篇》曰:“吴之与越也,接土邻境壤,交通属,习俗同,语言通。”所以谭其骧教授说他们是“一族两国”。第二批:向宁绍平原南部迁移,河姆渡就是他们在南移过程中建立的一个聚落,在会稽、四明山麓以北,这样的原始聚落今后还将被陆续发现……这些部族早已习惯于水、山活动,《越绝书》卷八所说:“水行而山处,以船为车,以楫为马”的生活,被称为“内越”。秦始皇统一后,被其武力镇压逃入浙皖山区,后称为“山越”。进入浙南称为“瓯越”,进入福建称为“闽越”,进入两广和印度支那的称为“南越”和“雒越”,分支繁多,常被称为“百越”。

第三批人,运用长期积累的漂海技术,用简单的独木舟或木筏漂洋过海,他们的足迹可能很广,台湾、琉球、南部日本以及印度支那等地,被称为“外越”。

以上论述使我们清晰地了解越族的发展与吴越的关系,是“一族两国”。又如,吴越之界,历史地理学家陈桥驿在《吴越文化论丛·序》^[7]中作了详细介绍《国语·越语上》:“句践之地,南至于句无,北至于御儿。”韦昭注:“今嘉兴御儿乡也。”吴越分疆,《史记·货殖列传》曰:“浙江南则越。”“浙江”是古代越语地名,即今钱塘江,就是吴越以今钱塘江为界。《论衡·书虚篇》曰:“余暨以南属越。钱塘以北属吴,钱塘之江,两国界也。”“余暨”即今肖山。

这些颇有见地的阐述,的确为吴文化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论,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吴文化的基础是吴地文化,以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直至《吴越春秋·吴太伯传》记载:“……古公病,二人(太伯、仲雍)诋名药于衡山,遂之荆蛮。国民君而事之,自号为勾吴。吴人或问:‘何像而为勾吴?’太伯曰:‘吾以伯长居国,绝嗣者也。其当有封者,吴仲也,故自号勾吴。非其方科?’荆蛮义之,以而归之者千有余家,共立以为勾吴。数年之间,民人殷富。遭殷之末世衰,中国侯王数用兵。恐及于荆蛮,故太伯起城,周三里二百步,外郭三百余里,在西北隅,名曰故吴。人民皆耕田其中……”这段记载,真实地反映吴地的农耕历史,司马迁《史记》也同样有记载,而且作了进一步阐明,《史记·太伯世家》:“自太伯作吴,五世而武王克殷,封其后有二:其一虞,在中国;其一吴,在夷蛮,十二世而晋灭中国之虞。中国之虞灭二世,而夷蛮之吴兴。大凡从太伯至寿梦十九世”。《正义》:“中国之虞灭后二世合七十一年,至寿梦而与大,称王。”

为什么吴国到寿梦时,从一个农耕民族变得强大呢?《左传·成公七年》载:“(申公)巫臣请使于吴,晋侯许之。吴子寿梦说(悦)之……与其射御,教吴乘车,教之战阵,教之叛楚。真其子狐庸焉,使为行人于吴。吴始伐楚,伐巢,伐徐,子重奔命,马陵之会,吴入州来,子重自郑奔命,子重,子反于是乎一岁七奔命。蛮夷属于楚者,吴尽取之”,应该说这时候的宁镇地区也逐渐成为吴国之领地,“自以始大,通吴于上国”。

上述清楚地反映了由于吴晋通和,吴向中原学习到不少先进的文化,例如乘车、布阵……从一个农耕小国逐渐成为军事强国。这时的吴向西、向北进行了扩充,吴国的领地大了,宁镇地区也成为吴国领土。吴予庆封朱方之县。朱方,《吴地记》曰:“朱方,秦改曰丹徒。”而《汉书·地理志》:“丹徒,

注师古曰:‘即春秋云朱方也。’所以寿梦—夫差,这一百多年中,吴国的领土在不断地扩大,但吴的核心区,也就是历史上一直延续不断的吴地始终没有变,越灭吴,变成了越领土,但鸿山越国贵族墓地却证实了这一点,因在越王翳三十三年又迁于吴。到楚代越,《史记·春申君列传第十八》曰:“春申君因城故吴墟,以自为都邑。”1993年在小真山发现春申君墓,这都反映吴地不是因王朝衰落、政权更迭而改名,吴地还是吴地。秦始皇时“大越”被改名为山阴,而吴的旧都还是保留旧名“吴”,《汉书·地理志》曰:“吴,故国,周太伯所邑。具区泽在西。”《后汉书·郡国四》:“吴郡下,吴本国……”

总之,吴、越、楚贵族墓地在吴地发现,充实了东周史上的考古材料,印证了文献史料的记载,也填补了文献史料的不足。它承上启下地反映了吴地吴人发展的历史,其主线是一脉相承的吴地文化。全面探讨吴越关系、吴楚关系,使我们能从单纯的吴文化研究向多学科、多文化、多视角地研究商周诸侯文化史的转变,并从中得到新的启示,也就是要全面了解太湖流域先秦文化,必须要同时了解越文化。正如要了解商周宁镇地区文化,必须要了解南淮夷文化,才能全面深入地了了解苏南先秦文化一样。所以,吴、越、楚贵族墓地同在吴地,对充实吴地文化的实物史料,开拓吴文化研究的视野,提供研究吴文化的新方法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和深远的意义。

[1] 苏州博物馆《真山东周墓地》,文物出版社1999年;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无锡市锡山区文管会《无锡鸿山越国贵族墓发掘简报》,《文物》2006年第1期;南京博物院、江苏省考古研究所、无锡市锡山区文物管理委员会:《鸿山越墓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7年。

[2] 苏州博物馆《苏州长桥新塘战国墓地的发掘》,《考古》1994年第6期。

[3]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浙江考古精华》,文物出版社1999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长兴县博物馆《浙江长兴鼻子山越国贵族墓》,《文物》2007年第1期。

[4] 淮阴市博物馆《淮阴高庄战国墓》,《考古学报》1988年第2期。

[5]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绍兴306号战国墓发掘简报》,《文物》1984年第1期。

[6] 陈桥驿《于越历史概论》,《浙江学刊》1984年第2期;陈桥驿《越族的发展和流散》,《东南文化》1989年第6期。

[7] 陈桥驿《吴越文化论丛》,中华书局1999年。